

引 子

中国是一个教育大国，也是一个教育古国。两千多年前大教育家孔子的出现，就让神州大地阳光普照。从汉代开始，考试制度的出现，让众多望子成龙的家长们找到了光宗耀祖的最佳渠道。几乎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教育一如温暖的阳光在老百姓的心头挥之不去。为了名题金榜，古往今来众多望子成龙的家长用“凿壁偷光”、“头悬梁，锥刺股”的训诫教育子女，而范进中举的典故则将应试教育的高度推向了极至。

中国考试制度已经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演变过程——

汉代：察举制（由地方官吏考察推举）

魏晋：九品官人法（由中正官按照九种等级考察人才）

隋代：设进士科

唐代：完备的科举制

1905 年：废除科举制

1938 年：民国国立高校联合招生

1949 年：“维持原校”仍然单独招生、

1952 年：全国统一招生考试

1964 年：分文理两科

1966 ~ 1976 年：停止全国统考招生

1977 年：恢复高考制度

对于当代中国人来说，中国的考试制度留给我们最深的烙印有两个阶段。一是“文革”期间长达 10 年全国统考招生制度的停止，残酷地剥夺了千万青年进大学深造的权利，同时也泯灭了众多家长望子成龙的欲望；二是 1977 年高考制度的恢复，如经历漫长严冬之后的缕缕春光让无数的人欣喜若狂奔走相告，那情景那场面让人激动不已且难以忘怀。

自 1997 年开始，每年的高考是亿万中国百姓心中挥之不去的一道坎。

对于众多家长来说，与孩子一同付出了许许多多的艰辛之后终于盼来了孩子参加高考的日子，其心情大都是美丽而甜蜜的。毕竟，眼看着孩子就要长大，眼看着十几年的辛劳与期待就要结出丰满或干瘪的果实。

但与此同时，他们的心情同样紧张——不，甚至比他们的孩子还要紧张。就是在 1997 年夏天——恢复高考 20 周年之际，中国的一些城市出现了一些奇特的场景——

哈尔滨：从 7 月 7 日起，一张写有“高考，车禁行”字样的标语，贴在临时横卧于该市道里区上游街中央的课桌上。数百名高考考生家长守卫在第 18 中学所在的上游街两端，借助一条红色“拦路绳”，将欲经过考点的汽车阻拦住。这样的“封街”行动持续数天，以至按照正常规则行驶的机动车，包括多路公共汽车及一辆农业银行运钞车都被迫违章绕行。前去劝阻的哈市教委、道里区政府及交警大队有关人员均遭到围攻。家长担心汽车噪音会影响考试的孩子，声称：“是老百姓自发的行动，你能咋的？”

上海：一名李姓女生高考前随父母回沪，因奶奶家不宽敞，她和母亲住进附近一家三星级的宾馆，320 元一天，准

备住到考试结束。有报道说，杭州城内酒店、宾馆纷纷推出优惠考生住房服务项目，生意十分兴隆。一些酒店人员说，明年要早做准备。

北京：应广大家长要求，市建委高考前发出通知，在 6 月 20 日 ~ 7 月 10 日期间要求各施工单位减少噪音污染，除抢修工程和重点工程，停止夜间施工工程。众家长高考前那颗悬着的心总算稍微往下降了降。

.....

北京建筑工程学院曾对 1998 年入学新生做过调查，有 60% 的人认为面对高考，父母比自己更紧张。主持这一调查的该学院心理咨询中心主任郑宁老师说，让学生填完问卷后，他连续翻了很多张，当时就有些震动。因为面对高考的毕竟是考生自己，而许多学生在回答“家庭中谁更焦虑”的问题时填的是“父母”，而填“母亲”的更多。

为什么父母比孩子更焦虑呢？郑宁老师说，可能有这样几方面的原因：一是父母看问题比孩子更远一点、更现实一点，知道孩子考不上大学的后果是什么，因此心理压力比孩子大；再一点是父母对孩子的期望值过高，有些甚至是把难以达到的愿望寄托在孩子身上，希望孩子能成功，特别是独生子女，好像就是惟一的希望；另外有些家长从小就对孩子大包大揽，孩子还没出生就有许多计划，从幼儿园到小学、中学，都要找最好的，而大学虽然没法替孩子找了，但孩子考得上考不上，家长也觉得是自己的责任。有的时候，做父母的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比孩子还焦虑。一部分父母担心给孩子增加心理压力，有什么话不敢和孩子说，甚至有学生告诉我，高考之前父母都不敢对他大声说话。但家长的这种状态

无形中还是会给孩子压力。那么多学生认为父母比自己更焦虑，那是因为他们从家庭的气氛中感觉到了。

郑宁老师说，要让孩子减轻焦虑，家长首先要处理自己的焦虑。他提出几点建议：有些问题，家长可以找有关的老师咨询，做到心中有数；但更重要的是，家长要明白自己不能包孩子一辈子，同时要信任孩子。有些家长希望孩子能考出最好水平。最好水平是超常发挥，比如经常考 90 分的孩子，某次考了 100 分，就可能是超常发挥。如果把超常当成正常来要求孩子，孩子达不到，家长就可能越来越失望，家长的态度就容易给孩子造成压力。

郑宁老师的分析虽不无道理，但对于众多家长来说，他们心头的压力却并非吸烟者吐出的烟雾，可以挥之即去。因为感受到考试压力的，并非仅仅是家长和学生，同时也还有学校的老师。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压力虽由高考而来，但正由高向低传染扩散，在中考形成同样的高强度。因为中考的好坏，很大程度决定着考生能否升上重点中学，而能否上重点中学又决定着考生能否在高考这一决定人生命运的关键时刻稳操胜券。

作家梁晓声在一篇文中写道——

曾有一位外国朋友问我：“处在转型期的中国人，哪些人的心理负荷最大？”

我不假思索地回答：“首先当然是政治局的成员。”

她又问：“其次呢？”

我说：“那就要数我们这一代的儿女们了。”

她顿时“友邦惊诧”起来：“你们不是认为你们的下一代简直就如同‘小上帝’，一个个幸福得都快溺死在蜜罐子

里了么？”

我说：“那样的一些孩子是有的，但属极少数。中国还有相当多的孩子贫困得根本上不起学；而大都市的孩子们却像野兔，已经被分数这条极其凶猛的猎犬撵咬得疲于奔命，倒毙升学途中！”

一位初三学生给报社投寄了一篇题为《老师，请不要再倒计时了》的呼吁，会使你感受到中考那令人窒息的压力——

3月5日是学雷锋的日子，3月5日是纪念周恩来总理诞辰100周年的日子。可是我们的班主任老师，这一天您没有跟我们讲这些，这一天您在我们黑板的左上角挂上了醒目的“距中考还有100天”的倒计时牌。

从此，我们的老师，您就天天对我们说，您就一天几次对我们说：“距中考还有x x天……”

老师，不知您是怎么想的。总之，这中考倒计时牌跟香港回归倒计时牌，在我们的眼里，在我们的心中，是大不一样的。香港回归的倒计时牌，我们越看越想看，越看越兴奋，越看越激动。可是这中考倒计时牌，我们越看越不想看，越看越心烦意乱，越看越心惊肉跳。事与愿违，适得其反。老师，不知您想到这一点没有。

早晨，当我们正兴致勃勃地读书时，您突然敲着倒计时牌对我们说：“距中考还有x x天！”顿时，我们的兴趣全没了。一直到下课，那原有的浓厚的读书气氛就再也形成不起来了。您说得越早，我们浪费的时间就越多。一日之计在于晨。唉，多么可惜啊！

中午，当我们伏在桌子上正想休息一会儿时，老师，您又走进教室，敲着倒计时牌对我们说：“距中考还有 $\times \times$ 天！”一下子，我们刚要松弛一点儿的心弦又绷紧了。睡意虽然暂时被赶跑了，可是带来的却是整个下午难以忍耐的瞌睡。老师，您可知道，就是那么几分钟，就是那么十几分钟的睡意被您赶跑了，我们的下午是多么难熬啊。我们欲睡不敢，我们欲听不能。即便是强打着精神听讲，可是听着听着，我们的耳边就会响起您敲倒计时牌对我们说话的声音；即便是我们硬撑着眼皮看黑板，可是看着看着，我们的视线就被倒计时牌吸引过去……

晚上放学，老师，您可知道，此时此刻，我们是多么希望您正在家里吃晚饭或正在家里看电视。可是，当我们背着沉重的书包，拖着沉重的脚步准备回家时，老师，您又不辞辛苦地赶到教室更换着倒计时牌的日期对我们说……

好了，您这一说不打紧，可我们的心整个这一夜却再也不得安宁了。

吃晚饭时，吃着、吃着，我就会情不自禁地想起那个倒计时牌，就会想起您说的那句话。于是，我就默默地放下碗筷，再也无法咽下父母为我准备的美餐。父母看到我这样，也只能噙着泪，摇着头，叹着气为我收拾碗筷。看到父母这样，我的心情就更加难过。父母不知道我的苦衷，为了您，老师，我也没向父母诉说这苦衷。

做作业时，想着想着，您的那句话又在我的耳边响起，那个倒计时牌又在我的眼前浮现。于是，我的思路就再也无法清晰起来，不是把题目看错，就是把答案写错……没有办法，只好睡觉。临睡前，我曾告诫自己，不去想您挂的那个

牌子，不去想您说的那句话。可是一躺到床上，您说的那句话，您挂的那个牌子又魔鬼般地出现了。尽管我是那么地想睡，尽管我拼命地数着 12345……可是我就是无法入睡。烦躁极了，我就疯狂地挥出我的拳头使劲地捶自己的胸膛，使劲地敲自己的脑袋，然后再歇斯底里的大吼一声——“啊……”只有这样，我的心里似乎才觉得好受一点。然而却又容易引来父母的惊慌失措，我的内心又感到十分的不安。

后来，迷迷糊糊地睡着了，可我仍模模糊糊地看到老师您在教室里敲着那块牌子对我们说……恶梦中，我的耳边有无数种您的声音在对我怒吼；恶梦中，我的眼前有无数个倒计时牌在飞舞……好几次，好几次，我都是从这恶梦中惊醒。尽管也算是睡了几个小时，可是醒来后，我的头脑更加迷迷糊糊、昏昏沉沉。醒来后，发现父亲和衣卧在我的床边，母亲已在橱房里为我准备早饭。看到可怜可敬的父母，我心如刀绞，泪如泉涌——敬爱的爸爸妈妈，您的不孝儿子让您操心了，儿子对不起你们！

吃早饭时，只隐隐约约听父母说什么休学的事。休学，我是多么想休学啊，可是休学的机会已经错过了。我又不想休学，休得了今年，还休得了明年吗？谁还能说准明年的这时，老师您不再挂那个牌子呢？您不再喋喋不休地说那句话呢？

那个倒计时牌，是一个魔牌，是一个鬼牌！

老师，您可知道，多少次，多少次，我们会想把那个倒计时牌砸掉，或偷偷拿掉再藏起来。可是我们忍住了，没那么做。不过，我们还是有了一点表示的。老师，您还记得，有一次倒计时牌倒转着身子朝里吗？您还记得，有几次倒计

时牌子上数字被擦掉一位吗？您还记得，有一次倒计时牌下面的黑板上写着这样的诗句：长夜难明考试天，百日计牌舞蹁跹，学生五十不安宁……

老师，还知道吗，我们班上曾有人打算逃学，曾有人打算出走，曾有人打算自杀。多么可怕！老师，您不要以为我这是在骗您，您不要以为我这是在吓唬您，这些打算确实是有过的啊，有的甚至已付诸了实施，只不过被家长及时发现并妥善处理了罢了，只不过没让您知道罢了。老师啊，您可要警惕啊，您可要当心啊！

老师，我们也到其他班级看过，我们也向其他学校的同学了解过。他们的班上也进行倒计时，只不过形式不完全一致罢了。我们敬爱的老师，在大声疾呼素质教育的今天，你们为什么还这么做，你们为什么都这么做？你们到底是怎么啦，你们到底想把我们学生怎么啦？

老师，求求您，请不要再倒计时了，为了我们。

求求您，老师，请不要再倒计时了，也为了你们。

请救救我们吧，请救救我们的老师吧。因为还有一些日子，因为还有明年……

第一章 指挥棒的魔力与罪恶

在当今中国大地，应试教育业已成为过街老鼠，而躲在校园深处的名次排队却依然作恶且安之若素。在素质教育呼声日益高涨的今天，外界是否知道那顽固地肆虐并迫害着青少年学生的校园凶手呢？

1. 名次排队 盘旋在中小學生心灵上空的暴风雪

理达是北京某重点中学的一名教师，可以说是地地道道的教育“圈内人”，对学校教育中的许多“幕后动作”可谓了然于胸。1998年，他寄给《中国青年》杂志一篇题为《名次排队的忧思》的文章，掀起了中国教育界围绕应试教育指挥棒进行排队的“冰山一角”——

*“排队，，面面观

一次较大型的考试后，总要有一些学生追着教师问排不排队，若哪一位开明些的教师吐出“不排”的金口玉言时，往往会激发起学生的热烈欢呼。在学生中流传的校园隐语中，称家长会为“今夜有暴风雪”，指责家长为“暴风雪”

的源头大约也由于名次排队。可能一个班级中只有排名第一的学生能躲过这场“狂风暴雪”（当然免不了“保持下去”之类的激励），甚至名列前茅的一些学生，由于家长期望值甚高，也往往难免一劫。

名次排队大多是要张榜公布的，也有的教师会输入电脑，在每次期中、期末考试后打出来。于是每个学生、每位家长手中便有了一张起伏不定的荣辱榜。当然，有时这些“榜文”也会暂时收束起来。有一位教师曾对我说起他的一位学生。期末考试，这个学生名列全班第 51 名（倒数第 8 名）“她（母亲）会打我，会罚我下跪的！”这位学生向老师哭诉。在得到“下次一定努力，一定进步”的保证之后，教师答应了，暂时不向这位学生家长公布“榜文”。不想下次考试，她物理考试又失败了，于是偷偷摸入办公室，抽换了考场的试卷。“这孩子不诚实，品质坏了！但我没有对她母亲说，怕她出事，我可不想负这个责！”这位教师对我说。亲戚中有一个高二学生，我不经意地问起他的名次，他凄惶地说：“我是圈外人士。”“嗯？”我不懂。“每次考试后，老师都要画定一个名次圈，称为‘希望圈’。画到圈外的，就被老师、同学视为‘圈外人士’……”他解释，眉目间笼着铅一般的阴云。学生中私改成绩单、名次表的绝非个别。

“名次排队”给学生巨大的心理压力，教育领导部门和很多领导者也不能视若不见。1996 年期中考试后，某区一座市重点中学，一名初三学生惮于排名的压力，留下一纸遗书，自杀了。新闻界没有炒卖这条新闻，但接下来一些领导者的表现却耐人寻味。全区紧急通知“取消名次排队”。附

近一所区重点中学正在准备开家长会，排名大榜已张贴在会场，得到通知，匆忙撤下。校长向班主任们面授机宜：名次一定要排，一定要让家长知道，但不许写出来，不许印发下去，不许留下把柄。至于怎么传达给家长，你们自己看着办。这就奇怪了：如果名次排队是必须实行的好事，就光明正大地坚持得了；如果名次排队是弊大于利的坏事，就该理所当然地废止。这种必欲行之又谨防非议的心态与健康的社会主义教育事业是格格不入的吧？

名次排队带给学生的负面影响绝不止是心理上的沉重压力。某些学校是以量化来计算学生的综合表现的。在量化名次表前列的，可以享有各种优待：座位靠前，免做值日等等；在后的，座位要靠后，值日要双份。量化的内容也包括考试成绩，例如第一名可以加分，那么最后一名就要扣分。不过，分数是可以用钱、物弥补的，向班里捐款捐物就可以因为“热爱班集体”而补回一些分的。在这种管理方式下，名次、分数、荣辱、实利、金钱完全被搅为一团，污染着学生的纯洁的心灵。

在名次排队的磁场里，是无法推行素质教育的——如果哪位校长、哪位教师还有心“素质”一下的话。学生在积累着分清“应试”与“素质”界限的经验，既然名次上只能反映有硬指标的考试成绩而很难表现软性的综合素质，那么有谁还去旁顾应试圈外事。课堂外，与应试没有直接关联的讲座、社团，很难吸引学生的目光和脚步。团队活动萧条，科技活动冷落，文学书籍蒙尘。学生知识面狭窄，动手能力极差，综合素质令人担忧，就是考试成绩本身也开始受到自身的报应。由于语文学科尤其是作文，应试努力与考试成绩很

难产生短期内对应的效应，因此受到严重冲击。北京市 1997 年语文会考及高考成绩大幅度下降，特别是考生作文总体水平之差，不能不令人担忧。学生在学习中的偏科本应由学校运用教学手段予以制约的，现在反而受到校方引导。在某些推行中考科目改革的试点地区，化学课被砍掉了，政治课被削减了。学校要的是中考成绩，要的是排队名次的荣光，这是最实际、最实惠的。名次排队不但摧残着学生，也吞噬着教师的良心。

名次排队将每位教师的工作压缩成一张表格，表格里没有他的诸多软性工作，无视复杂的客观因素，只展示应试的最终结果，而这结果又关系到每位教师的荣辱升迁。那么，哪些是提高排名的直接因素，哪些做法能立竿见影，越来越多的老师能在心中拨算出一笔精明的“小九九”。谁还去顾及学生的全面素质呢？于是学校教育被压缩到应试的狭小空间，课堂教学变成为应试的题海大战。

名次排队的荣辱是比较而存在的。那么，各区之争，各校之争的里面，各科之争，各班之争也就愈演愈烈。我曾见到一位语文教师，急匆匆拿过高考成绩各校排名表，当看到自己以高于第 12 名 0.1 分的差距居于区第 11 名时，她额手称庆，长舒了一口气。因为这是那所学校五科中的最高名次，未来的一年里，她可以扬眉吐气了。不少的老师潜滋暗长着这样一种心态，要让自己的一科统制学生有限的时间。某区重点中学的一位教师，强令任教班的学生课余、周末去听他的“家教”，除家教费之外，物理课高考自然也名列前茅，于是名利双收。有的老师在名次排队的压力下，也祭起了这个法宝，每次小测验都要排队，名次通知家长，后 10

名上收费“小灶”，这种方法居然被校领导表彰推广。各科课程本是相辅相成的，在名次排队的冲击下，各科之间竟成为水火之势。与此同时，班级之间的正常的竞争也演化为教师之间的心计之争。每到高二或高三，各校都要分文班、理班。一般的情况是，各理科班分别分出少部分同学组成文科班。分出去的学生是怎样一种状况直接影响着原班的整体水平。分班时往往是各个班主任最紧张的时候：对成绩好的同学他要强调文科多么难考，出路多么狭窄，千方百计留下；对成绩差的同学则劝导只有转学文科才有可能重振旗鼓，东山再起。一张嘴两面说，还有多少良心？一张脸一面热一面冷，还有多少真诚？留住一个优秀生，劝走一个差等生都无异于一场战斗的胜利，那位班主任会笑在脸上，喜在心头。的确，在最后的名次排列上只有冷峻的数字，而各班的差距又大都在分厘之间，一个学生就可能关系到他终生的荣辱。能怪这些教师吗？在如此接近的现实利益的驱策下，良心又值几个钱？

即使是很优秀的教师也仍然在名次排队的阴影下战战兢兢。某市一位享有盛誉的班主任老师，在高一升高二时，坚决向学校辞去班主任职务。他提出了种种理由，但周围许多教师心里有数，惟一重要的理由是：由于他的盛誉，他的班里挤进许多后门生，后门生成绩差，在未来的高考排队中，这个班败局已定。盛名之下，难陪末座；良心未泯，他又不能去唆使学生作弊。他的辞职实在是痛苦而无奈的。我曾聆听过北京市著名特级教师宁鸿彬先生的报告。在巨大的排队压力下，宁先生不把自己的压力转嫁给学生，坚持不留作业，坚持少要一课时，这种反潮流的勇气实在让人敬佩。但

是，宁先生一再解释，不与他人比名次，只比效率，即在单位时间内学生的成绩。谁都知道，效率是无法比的。在这种解释之下，我们隐隐能感到宁先生良心的巨大压力。退一步讲，除了宁先生这种德高望重的特级教师，又有谁能视名次排队如无物？又有谁有资格去讲“效率”？你要良心和效率，校长却是要实实在在的成绩！

校长也是无奈的。有的市、区有这样一种惯例，每次中考、高考后，教育局长要召见各校校长。召见是依名次排队次序进行的，排在前面的，笑脸祝贺；排在后边的，先坐冷板凳，再看冷面孔。一校之长，谁受这个？不受也得受！我曾和不止一位校长谈过这事。校长们无不摇头叹气。有的说，学校要生存，现在社会看重的就是升学名次。没有好名次就没有择校生，就没有赞助费，学校一百来号人，吃什么？有的说，不给教师排队，怎么发奖金？怎么调动积极性？我这个校长还怎么当？

正是在这种种顾虑的驱动下，很少有校长对升学考试，毕业会考中的作弊现象，采取真正势不两立的坚决斗争。不公开怂恿就算不错，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现象大有人在。在名次排队的压力下，素质教育哪里还有立足之地？校长有怎样的素质，就有怎样的素质教育，谈何容易？校长的难言之隐，校长的心灵扭曲又有几人深知？

＊“队”是由谁排的？

名次排队拨动着学生、教师、校长的心弦。实际上，不同的阶层关注的排队是各不相同的。期中、期末班级年级的排队，牵动的是学生的心，它是教师调动学生积极性的手

段，校长是不大理会的。中考、高考的排队，牵动的是教师的心，它是校长调动教师积极性的手段，学生是不大理会的。那么，这最后结算的排队究竟是谁搞的呢？从表面看，始作俑者是校长们，实际并不那么简单。一个偶然的机，我看到一份材料，是某市一位人大代表提供给我的。因为他在开市人代会时，那份市《政府工作报告》在谈到教育问题时披露了本市有关考试成绩的各项数据。他认为极不妥，于是讨论时与另 6 位代表向大会提交了一份名为《在全市范围取消按考试成绩排队的建议》的提案。不想市教育局的办理复文则称“市教研机构为进行教学分析，在每年中考、高考后都要编制一份分数统计表，此表只供内部参考，教育局从未公布过更没对学校按成绩排定过名次”云云……全然否认市人代会《政府工作报告》中的那些数据。

然而事实胜于雄辩。当我见到那位代表时，他一言未发地拿出几份表格，其中有《1996 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 x 市文史类应属考生各科成绩及格率、总分上线统计》、《文史类 1996 年高考 x 市 x 中学文史班各科任课教师平均分、及格率及上线情况统计表》（同样表格还有理工类各一份），《理工类 x 市 x 中 1996 年高考（1~5）班班主任、总分及上线情况统计表》，此外还有中考的各种统计表格。我用探询的目光提问，那位代表用手指敲着表格：“这些在全市很多学校都在印发，它们不仅是奖励等级的标准，而且白纸黑字，千年不烂，关系着上面每个姓名的荣辱。”再追问表格上各种数据的来历，那位代表惟有苦笑。

我疑惑难解，又向一些同志请教，有知悉内情的人告诉我：“数据当然是市教育局透露的。既称透露当然不是直接

的。有的是局直属科研单位归笼数据后私下出售给各校的，有的是校长们通过种种私人交情套取来的，总之，‘各庄的地道都有高招’……”我提起市教育局复文中关于考试各项数据的“六不准”和“泄密予以追究”等内容时，那位同志说：“你也太当真了！”说着，他给我讲了市教育局召集的一次校长会议。会上，就是那位宣布“六不准”的局长，面对几十位校长说：“谁说我们排队了？我们从来没排！谁再说排队，下次就不给他数据……”话被哄堂大笑打断，笑声中传达了心照不宣的默契。有的校长公然说：“什么素质教育？扯淡，老子就认分！”对这种公然宣战，“六不准”局长报以赞许的微笑。

一叶而知天下秋。“队”是谁排的，我们都该明白了。

※不“排队”怎么办？

实事求是地讲，名次排队并不是教育界的独家专利。运动员要排名次，唱片发行要排名次，甚至作家也要排名次。这些排名有些是必要的、合理的，有些则是弊大于利不尽合理的。竞技体育的排名是基于竞赛的目的，又有严格的规则与监督；学校考试的目的并不是竞赛，并且不可能排除复杂的内外因素的影响，不可能有如检测兴奋剂那样严格的监督。而且评价标准也很难统一，例如在田径赛中差 0.1 秒是银牌，差 1 分钟也可能是银牌，这是很公平的，因为它要的是名次；而在考试排队中就未必公平，数学排队第 5 名，但比第一名只差 1 分，物理排队第 2 名，但比第一名差了 8 分，你应当用哪个作评价标准，名次还是成绩？

实事求是讲，名次排队也并不是一无是处，它的确能调

动学生、教师的积极性，但和一切事情一样，物极必反，当名次排队成为主要的甚至惟一的硬性指标来评价它所面对的软性对象时，弊端就处于主导地位了。它调动教师的积极性的最终结果是扭曲了自己，也扭曲了学生。难怪有的教师说：“我们是在辛辛苦苦地摧残学生！”当教育列车已被名次排队拖进应试教育的死胡同时，我们难道还不该限止它吗？不错，很多校长面对管理学校的课题，肩负学校生存的压力。但这管理和生存的最终目的是什么呢？你以名次排队来刺激学生吗？学生必然以畸形的心态和素质作出反弹。教育的成果不只表现在一次升学考试之后，教育的成果更表现在三年五年、十年二十年之后。当我们垂垂老矣之时，其时社会的中坚，我们当年的学生，将给我们一个怎样的生存空间，怎样的晚年光景呢？对某些市、区教育领导部门来说，“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忠诚党的教育事业”不应该是一句空话，对素质教育的真实态度便是最好的试金石。

取消了名次排队之后怎么办？怎么调动教师、学生的积极性？怎么把应试纳入素质教育的轨道需要在实施中探索。不塞不流，也只有坚决制止官僚主义、形而上学的名次排队，才可能开通素质教育的渠道，找到评价教学的合理的、健康的、积极的标尺。高考报名方式的变革是高考与中学脱钩的第一步。可以预见这一脱钩势必带来诸多新问题。是不是中学会对学生高考不负责任？是不是会打乱中学教学常规？是不是会使形形色色冒牌辅导班如鱼得水？是不是会使高价家教如雨后春笋？是不是会使学生、家长负担更重，无所适从？问题很多，但只能在实践中统筹解决。

但制止名次排队作为重要目的之一的高考报名方式的变